



非洲的合作社与集体主义演变

梅西·德达·奥塞, 为 ROOTS 撰稿

2026/02/18

合作社是为人服务而非单纯逐利的企业。它们由参与者所有并治理, 遵循一个朴素的民主真理: 一人一票。无论出资多少, 每位成员在决策桌上均享有平等席位。通过联合起来满足共同需求, 合作社将顾客和员工转化为利益相关者, 携手构建一个更美好、更具价值导向的未来。

国际合作社联盟(ICA, 1995)确立了七项核心原则: 自愿与开放的会员制; 社员民主管理; 社员经济参与; 自主与独立; 教育、培训与信息; 合作社间的合作; 以及关注社区。

这些正式的原则是现代产物, 合作社的价值观早在该概念正式推广之前, 便已在非洲传统社会中蓬勃发展 (Develtere et al., 2008)。非洲正式合作社的兴起, 实则是多重历史阶段层层积淀的结果, 每一阶段都深受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发展经验的深刻影响。



早在前殖民时代，合作社的精神内核便已借由深厚的公社传统，深植于非洲社会之中。尽管彼时尚无‘合作社’之名，但各类本土机构在实际运作中早已体现了其核心原则。

这些机构包括储蓄信贷协会（如 **susu**、**edir** 和 **ebiyombe**）、集体劳动组织（如肯尼亚古西族的 **Amasaga**），以及各类互助会和丧葬社团（**Ouma, 1987**）。尽管未被正式界定为合作社，但这些团体在功能与实践上均具备合作性质，建立在互惠、互信和共享社区利益的基础之上。

“**Harambee**”（齐心协力）和“**Ubuntu**”（“我在，因为我们在”）等哲学思想，精准概括了对于现代合作社成功至关重要的“集体主义”与“互助主义”精神（**Mbiti, 1969**）。从社会学与心理学角度看，集体主义是一种文化或社会取向，其核心在于将群体（尤其是群体内部）的目标、需求及生存置于个人利益之上（**Brewer & Chen, 2007**）。与之相应，互助主义则指一种自愿的合作交换机制：个人或群体间进行商品与服务的互换，既不求取利润，也不存在剥削。

现代合作社引入于殖民时期，并经历了四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：殖民起源期、后殖民时代、经济自由化时期以及当今时代（**Develtere et al., 2008**）。

在第一阶段，合作社的建立旨在服务于殖民利益，如资源掠夺、征税及政治控制；然而，具体动机与管理方式因殖民列强（英国与法国）及不同领地而异。在加纳、肯尼亚、尼日利亚、坦桑尼亚、乌干达、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英语国家，英国仿照自身传统建立合作社，以推动农业生产，服务于宗主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创造财政收入（**Develtere et al., 2008**）。合作社沦为殖民者强迫农民转向经济作物种植的工具，迫使其放弃粮食自给，转而依赖微薄收入购买进口食品。以肯尼亚为例，直至1944年，合作社成员资格仍严格限制为白人农场主及劳工（**Ouma, 1987**）。此类组织均受严苛法律管制，其运作模式与性质皆由法律明确界定。

其他殖民列强的策略则各有侧重：法国人视其为同化与现代化的工具，比利时人借其组织被统治者进行强制生产，葡萄牙人则主要将其作为提升农业产出的手段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埃塞俄比亚等国涌现出了“内生性”的合作社传统。正因未遭受直接的殖民统治，这些国家的合作社并非外来强加的产物，而是专为应对本土社会经济需求而自然萌发的。

合作社发展的第二阶段处于后殖民时代（1960–1990年）。独立后，大多数非洲国家继承或“接管”了殖民时期建立的合作社结构，将其重新定位为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。这一时期，合作社的数量和会员人数呈指数级增长，涵盖农业、金融和住房等部门，规模远超殖民时代（**Wanyama et al., 2009**）。

合作社成为民族主义建国战略的核心。政府将其视为动员本地资源、培养超越阶级与种族分歧的国家认同的有力工具。因此，国家在合作社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将其发展纳入整体政府政策与立法之中。

然而，这种国家介入往往演变为过度监管与控制。政府常将合作社作为政治筹码，不仅把合作社领导人纳入政治体系，更将其异化为实施国家恩庇的工具。最终，许多合作社丧失了独立性与自愿性，彻底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。这一时期还伴随着重大的发展障碍，包括行政效率低下、创业能力匮乏、资本基础薄弱以及政治恩庇的普遍影响。例如，在独立后的肯尼亚，咖啡合作社沦为



国家管控外汇和奖励政治忠诚的集权化工具，导致高昂的行政扣款，侵蚀了农民的自主权(Widner, 1992; Bates, 1981)。

进入经济自由化时期(1990–2005年)，国家骤然撤出了其支持者角色(Wanyama et al., 2009)。审计、监督及管理培训等基础服务随之停摆，政府合作社部门也面临大幅裁撤或重组。尽管新的法律框架旨在赋予合作社运动完全的自主权，但这种急剧的政策转向却造成了监管真空。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环境下，许多合作社的经理人和当选委员会借机滥权，导致腐败、欺诈及严重的管理不善现象频发。

受此冲击，许多合作社纷纷破产。为稳定局势，多国重新建立起严格的监管体系，并修订了相关法律。这场危机倒逼合作社重拾互助初心，寻求长远发展之道，最终推动其数量和会员规模逐渐恢复增长。

当今(2005年至今)，合作社运动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，实现了从“依赖国家”向“自主驱动”的根本性转变。为应对历史遗留问题，非洲各国纷纷着手修订相关政策与法律(Develtere et al., 2008)。此外，随着工人所有制合作社等新型模式的涌现，以及女性和青年群体参与度的显著提升，整个领域的发展格局正日趋多元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Bates, R. H. (1981)。《热带非洲的市场与国家: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》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。
- [2] Brewer, M. B., & Chen, Y.-R. (2007)。《集体主义者在哪里(是谁)? 将集体主义重新界定为社会认同》。心理学评论, 114(1), 133–151。
- [3] Develtere, P., Pollet, I., & Wanyama, F. O. (编) (2008)。《通过合作走出贫困:非洲合作社运动的胜利》。国际劳工局。
- [4] 国际合作社联盟(1995)。《关于合作社身份的声明》。
- [5] 国际劳工组织(2002)。《促进合作社建议书, 2002年(第193号)》。
- [6] Mbiti, J. S. (1969)。《非洲宗教与哲学》。Heinemann 出版社。
- [7] Ouma, S. J. (1987)。《通过合作社实现肯尼亚的发展》。Shirikon 出版社。
- [8] Wanyama, F. O., Develtere, P., & Pollet, I. (2009)。《重新发明轮子? 自由化经济中的非洲合作社》。公共与合作经济年鉴, 80(3), 361–392。
- [9] Widner, J. A. (1992)。《肯尼亚党国的崛起:从“Harambee!”到“Nyayo!”》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。